

我們不應該忽略的是，所謂「正統」不是從天而降的，而是通過人們的意志而製造了正統，通過「正統化」的過程形成了具有「正統性」的「既成事實」。三尾裕子的〈漢民族の民間信仰〉基本上論述同樣的題目，但她在結論中言及的也是人類學自己(特別是東亞研究)的課題。人類學的「橫向」研究，有助於我們理解微觀的、個別的事例，但往往分析不了其歷史過程。另一方面，「縱向」的研究，就是用歷史方法的研究，對個別的情況則不能一一盡述，但卻能闡明其歷史變遷過程。本人認為像三尾那樣把兩種研究方法綜合起來是最理想的，但一個學者能夠做到的畢竟有限。現在，以明清以後的時期為研究範圍的歷史學者，基本上進行短期的田野調查，以補充歷史資料的不足。人類學者在有效地利用這些歷史學者的研究成果的同時，還要儘量核實原始資料，培養「縱向」研究的觀點。

一直以來，人類學的研究，雖然以中國的周邊國或周邊地域、少數民族、姻族等中國的所謂的「周邊」為題目，但往往從儒教、宗族、或漢化等「中原」的角度來分析。本書的特點就是從「周邊」的視點重新考察「中原」，進而闡釋中國和中國文化。從這一點來說，本書發揮了人類學的特點，作出了新穎的嘗試。

最後，作為本文的結尾，謹介紹以東亞的視野來進行的中國及周邊地域研究的最新成果：三尾裕子和本田洋編的《東アヅアにおける文化の多中心性》、吉原和男、鈴木正崇、末成道男編的《「血縁」の再構築——東アヅアにおける父系出自と同姓結合》，都值得細讀。

川口 幸大  
日本東北大學

***The Bible and the Gun: Christianity in South China, 1860-1900.* By JOSEPH TSE-HEI LE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xxxvi, 207pp.**

在研究華南地區的村落／社區的聯盟或對抗關係時，眾多著作的重點均放於以血緣（不管是真實或虛構的）、地緣、族群、姻親等元素為基礎的村落和親屬組織，考察它們如何利用這些社會特徵／屬性來動員和策劃不同類型的合作或鬥爭。因此，這些著作往往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外在因素對地方社會衝突（包括村落組織內部及村落之間）的引發及加劇所起的作用。李樹熙這部著作正好說明了這一點。他以 19 世紀的潮州為例子，詳細分析了基督教的傳入如何進一步激發及複雜了當地村落的利益爭鬥。

該書合共十一章，含導言及結論。第一章至第五章分別介紹潮州在東南亞貿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當地的社會治安與秩序、基督教如何通過從海外回鄉的信徒進入潮州並得以在內陸地區擴展、對潮州地區信奉基督教的村民的統計及分析（包括年齡、性別、地區分佈、入教的時間）、以及當地教會之間的網絡及從屬關係。第六章至第九章則為個案研究，詳細探討基督教村民與非教徒的村民之間的流血衝突與訴訟、以及宗族不同房派分別依附基督教不同教派（如浸信會、長老會）來延續和加強既有的利益爭鬥。在結論一章中，作者提出應以草根階層（鄉村村民）及村落社區作為研究對象，突破已往探討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方式的研究方向及重點。

通過上述四個個案，作者揭示了潮州地區不同村落組織或某宗族房派之間的既有衝突，如何借助基督教來實現並合理化，以至進一步擴大以達致所預見的結果。因此，作者指出，鄉民對基督教的信奉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實際的考慮多於宗教原因。另外，作者亦提及基督教的傳入，主要是通過從海外回鄉的潮州人作為中介，利用他們在當地的親屬及社會網絡來吸納信徒及幫助興建教堂。正因這種傳教方式主要以當地社區既有的血緣、地緣、或社會關係模式來建立及伸展，因此基督教便完全陷入當地利益爭鬥的關係中而被加以爭取、利用或排斥。過往有關基督教在中國的研究，大多集中討論及分析它在沿海大城市及知識階層中的傳播問題，李樹熙這部著作加深了我們對基督教在 19 世紀傳入中國的特色，以及在地方政治的爭鬥和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認識，可說是開啟了以草根階層的角度來探索基督教在中國傳播及發展的特色的先河。另外，該研究提及基督教信仰與傳統中國祖先崇拜的協調，透視了前者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但對於這個問題，作者在書中著墨不多，究竟兩者的協調過程中（特別是關於祭祀祖先的問題上），西方傳教士採取了甚麼態度及扮演甚麼角色，而當地信徒又如何促成基督教在中國的本土化？再者，在潮州韓江區域居住的多為士紳和朝廷官員，他們對基督教有較多的抗拒，與鄰近榕江及練江地區有眾多村民信奉基督教這一情況形成強烈的對比。這種現象反映了基督教較為草根階層所接受（不論是出於宗教需要還是其他實際考慮），亦表示它更被視為值得爭取和可資利用的重要資源。雖然這批信徒的性別比例差異不大，但卻以中年及以上的年紀為主，他們在家庭、宗教、以及村落組織均享有較高的地位及權力；那麼，這是否意味他們在地方利益鬥爭（無論是策劃、動員或參與）都扮演了較主動和重要的角色？這是否表明了基督教的傳入並沒有改變了傳統中國地方社會的權力結構？事實上，潮州所處的廣東以及隔鄰的福建地區，很多村落在當時亦經常出現同樣的集體衝突及訴訟；那麼，潮州這個研究

個案能給予我們甚麼啟示呢？作者在結論部份點出了這個問題，但並沒有提出更多的答案。我們期待，作者日後能就這些問題作出更深入的探討。

陳國成  
香港城市大學